

征程如画

一条光明的路

我画过一些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但《瞿秋白》(见右图)这幅画,在我心里有一种特殊的位置。

长征开始后,为了保守红军主力已撤离苏区的秘密,瞿秋白继续编辑《红色中华》报,直到1935年1月。同年2月24日,转移途中,瞿秋白等人在福建长汀被捕,进入上杭监狱。面对敌人6天内9次劝降,瞿秋白作出了“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厉害,请勿撕破我的历史”的铿锵回答,于1935年6月18日高唱《国际歌》徐步迈向刑场从容就义。对我而言,《瞿秋白》这件作品,不只关乎一位共产党员、一个历史事件,更关乎“我总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的精神信仰,以及我作为一名画家,如何去理解和呈现一种真实而深刻的英雄主义。

这件作品创作于改革开放之初。在刚刚结束的“文革”浩劫中,一些人和事受到过不公正的评判,其中就包括瞿秋白同志。随着他的名誉被恢复,我也开始重新审视这位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一生。我读了他在狱中写下的《多余的话》。正是这篇用6天时间写就的文字,曾让他在身后蒙受误解。在我看来,那恰恰是一位真正的革命者在生命尽头对自己灵魂最严厉、最真诚的剖析。一个敢于在临终前冷静回顾一生、深刻自省的人,他的内心该是何等强大与坦荡。正是这种复杂而深邃的人格力量,触动了我,让我萌生了为他创作一幅肖像的念头。

我想画的,不是传统意义上顶天立地、慷慨就义的英雄,而是瞿秋白在生命最后时刻的沉思状态。这种构思,源自一张他临刑前的照片——他是那么平静、从容,甚至带着书生的文弱。于是,我放弃了描绘英雄慷慨就义场面的惯常模式,决定用近乎静默的方式,去定格他生命中最具分量的瞬间。

构思这幅画时,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营造那种“沉思”的氛围。画中的瞿秋白坐在狱中简陋的床边,身体微微倾斜,手臂支撑着身体,与躯干构成稳定的三角形。这种构图,既呈现了人物此刻安静状态,又以其稳固性,暗合了他内心的坚毅。人物在画面右侧,身后是大面积的青灰色牢狱墙壁。我用这种极其简陋的环境,营造英雄就义前的氛围,并引导观者将视线完全集中在人物身上。画面中唯一的具象道具,是他手下压着的一沓文稿,它象征着那篇《多余的话》,更象征着瞿秋白复杂而坦荡的内心世界。

英雄的立场

新尚谊



回顾我创作的几幅革命历史画,从《送别》到《毛泽东在十二月会议上》,再到《踏遍青山》,都与《瞿秋白》有着精神上的共通之处。《送别》描绘的是红军被迫战略转移时军民依依惜别的场景,那灰暗的黎明和队伍,蕴含着艰难中的希望;《踏遍青山》则取材于毛泽东的诗词,画面中乌云密布,但人物沉着前行,旨在表现革命低潮时期其坚定不移的信念。这些创作,都源于我对历史的理解:伟大往往孕于困顿与抉择之中,英雄主义不仅体现在枪林弹雨中的冲锋,也体现在至暗时刻对信仰的坚守。

或许有人会问,我为什么选择用如此古典、写实甚至个性化的方式来处理这些重大题材?我所追求的,从来不是风格的创新,而是要解决水平问题。风格是每个人天然的秉性与时代的印记,而水平是实实在在的、衡量油画艺术质量的基本标准。无论是画革命领袖,还是画普通人,我关注的都是如何用恰如其分的造型、准确生动的色彩,在画布上构建一个真实可信、富有深度的精神世界。

在中国,画好一张肖像油画比在欧洲更难。因为亚洲人的皮肤是黄色的,面部结构更为平缓,没有欧洲人那么立体,稍有不慎就会画得琐碎或概念化。因此,几十年来,我都在锲而不舍地研究和解决油画的本体语言问题,即如何在一个二维平面上,通过体积、空间、色彩和光影,创造出富有生命力的、富有中国精神的形象。创作《瞿秋白》,从构图到用光,每一个细节的处理,既是内容表达的需要,也是解决特定艺术课题的实践。我相信,只有当绘画的语言达到一定高度,它所承载的精神内涵才能被更准确、更强烈地传递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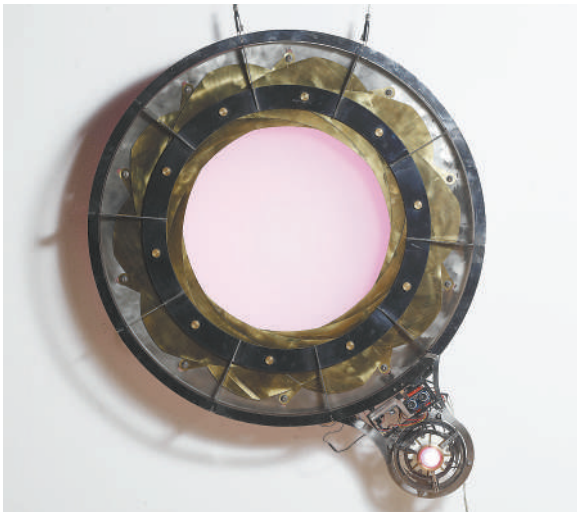
如今,年轻的画家们有了更多选择和工具,甚至有人用人工智能来辅助绘画。但我始终认为,机器生成的图像再逼真,也无法替代肉眼观察和心灵感受所获得的丰富性。技术再先进,也代替不了画家面对一个人物、一个场景时的真实体悟。

我常想,我们画的虽然是历史中的人,但留给后世的,应当是一种超越历史情境的精神价值。我希望通过《瞿秋白》这幅画,人们能看到一位“总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的先行者,在生命终点所展现出的深沉、自省与坚定。这便是我理解的英雄的立场:无惧生死,即便道路曲折,也依然能够在自省中从容走向信仰所指引的方向。

(作者为油画家、教育家,本报记者徐红梅采访整理)

让制造拥有美和温度

齐喆



在许多人印象里,制造业只有轰鸣的机器和单调的流水线。但今天,在广东东莞,制造业正呈现另一番景象。

走进“造物新生——2026制造美学艺术展”,你会看到日常的鞋履、服装、家具被解构重组,显露出设计巧思;废弃的电池、包装箱和泡泡膜,变成耐人寻味的装置作品;岭南特有的醒狮、千角灯等元素,被融入潮玩雕塑……每一件作品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当工业制造遇见艺术创造,会发生什么?

所谓“制造美学”,核心是以生产逻辑、材料物性和工艺伦理为根基,经由艺术家之手,构筑起兼具秩序感、精致感与匠人精神的审美内核。它不是简单给产品贴上“美”的标签,而是深入制造过程本身,去发现和提炼机器的精准运转、材料的天然质感、工匠的反复打磨之中蕴含的审美价值。

“造物新生”这四个字,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让物重获温度。当制造过程浸润了美的追求与文化的思考,产出的就不再是普通商品,而是能够温暖大众生活的情感载体。那些被艺术家重新诠释的鞋履、家具和工业零件,正在成为连接人与物、人与城市的情感纽带。第二层,是艺术与产业的双向奔赴。这种奔赴,不是艺术家的孤芳自赏,也不是企业形象的点缀,而是从心灵深处、从生产逻辑层面出发的交融与重构。当艺术与制造真正拥抱彼此,它们孵化出的,是兼具工业文明的理性、精确与秩序,以及艺术创作的感性、自由与想象的新事物。它也将回答时代之问:一座制造业城市,能否拥有高级的审美?

展览现场,一件金属互动装置作品《观测光圈》(见上图)引人注目。每当观众靠近,作品中光圈的机械结构便会放大,反之则缩小。作品的开合有其特有的韵律,视觉上展现出一种基于功能与效率的精确美感。精神层面,作品则希望告诫人们,不要因为个人偏好造成视野狭隘和认知偏见。另一组由废弃电池和电路板组成的装置作品也吸引了很多观众。艺术家没有刻意掩盖工业废料的粗糙,反而放大其肌理与色泽,让观者直面工业文明的副产品。

值得关注的是,展览采用“专业美术馆+企业展示空间”的双馆联动模式。主展区设在岭南美术馆,侧重沉浸式审美体验。平行展区设于鲮鱼洲文创园的锐空间,那是一个集产品展示、技术研发与文化传播于一体的复合型场所。把艺术作品置于真实的生产现场,既让创作与生产形成对话,也让观众更直观地理解制造美学的现实根基。

这样的探索,对东莞有着特殊意义。这座被称为“世界工厂”的城市,每天诞生数以万计的产品,从服装鞋帽到电子设备,从玩具模型到精密零部件,不一而足。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产品承载的只是“功能”二字。如今,东莞率先提出打造“制造美学之城”的战略构想,试图将深厚的产业积淀转化为独特的城市文化资本,推动城市从“功能输出”迈向“美学输出”,此次展览正是这一转型实践的生动注脚。

广州美术学院与东莞的渊源由来已久。近年来,通过多层次产学研联动,越来越多的师生走进工厂车间,与企业设计师并肩工作。他们从真实的生产现场汲取灵感,也用艺术思维为产品注入文化内涵。随着这种联动不断深化,高校的审美创意正转化为驱动城市转型升级的新动能。

一座真正的现代化大都市,不仅要专注于物质创造,更要构筑精神高地;不仅要有生产的精度和速度,更要有情感的温度和文化的厚度。这次展览尝试证明,制造业的升级不仅是技术的迭代,还是审美的觉醒与文化的重塑。透过艺术的窗口,观众可以探寻东莞产业发展的密码,感知中国制造的时代脉动,以及其中蕴藏的匠心、创造力和生生不息的造物之美。

(作者为广州美术学院工艺美术学院院长)

把中华美学融入日常好物

岳秋童



《周礼·考工记》有言:“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便有了关于造物的审美准则和制作规范。从商周青铜器到汉代画像石,再到宋代瓷器、明清折扇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藏的价值观与审美意趣通过一件件器物融入百姓生活,代代相传。如今,这份以物载道的智慧正借由文创产品焕发新活力。

要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文创设计必须扎根时代,把中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结合起来。面对这一课题,浙江卡游动漫有限公司尝试以轻巧的文创设计承载厚重文脉,把中华美学融入日常好物。

丰厚的文化底蕴是文创的精神内核。这意味着其设计不能脱离历史文脉,而应守文化之正、创时代之新。敦煌壁画记录了姿态万千的骏马形象,有的展现了古代生活的真实场景,有的呈现出古人对马的浪漫想象,这为文创设计提供了丰富灵感。当《张议潮统军出行图》等经典敦煌壁画以卡牌形式呈现,当设计师提取壁画艺术元素展开二次创作,当敦煌藻井纹样与骏马形象重新融合,国潮文创的想象边界再一次被拓宽。从千年壁画到新潮文创,从传统线描到数字绘画,敦煌艺术的载体在迭代,表达方式在革新,但石青、石绿、朱砂等颜色依旧瑰丽。中国传统色彩美学的气韵,不再囿于洞窟,而是化作看得见、感受得到的中式浪漫。

文创的表现力,藏于精工巧艺之中。在系列卡牌设计中,逆向纹理工艺赋予纸张真实的纺织触感,丝印烫金工艺使形象呈现立体浮雕感,折光粗闪特殊印刷工艺则表现了丝线的纹理和流光质感,传统绣扇独有的风雅韵致就这样被浓缩于方寸之间。设计团队还将多种现代印刷技法与传统手工艺相融,如以浙江洞头贝雕镶嵌卡面,以烫金线条模仿金石拓印意趣,让深藏于历史中的工艺美学触手可及。

人们在使用、把玩、欣赏文创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完成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对话。这场始于掌间的文化交流,正延伸至更广阔的世界。2024年巴黎奥运会前夕,外国友人在凯旋门附近对照中国古代体育文化收藏卡,学习中国传统健身项目八段锦;2025年,中国战机收藏卡亮相法国巴黎航展,受到多国飞行员的青睐。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美国纽约等地,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通过文创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以文创为载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变得更潮、更酷、更亲切。

文创设计,重在以文化为桨、以创意为帆,给人以精神滋养、情感慰藉。期待更多优秀文创产品载着典籍中的故事,带着文物里的温度,穿过时光长河,驶向人们内心深处。

上图为“方寸见色·马”系列卡牌。

读画

思入妙微 乾坤生意

李 静

自然之生机,并非只存在于雄浑壮阔的山河盛景。在花簇叶隙间、农田野地里,小小的草虫在伏击猎物、躲避危机、享用美食间,悄悄完成生命的轮回。这些小生命的故事蕴含着天地大道与人生哲理。元代谢楚芳所绘《乾坤生意图》(局部见右下图),便定格了一群草虫的多彩世界。

整幅长卷布局精心,刻画细腻生动,赋物各遂其性,以6组场景展现了生机盎然的大自然,起承转合皆有呼应。卷首,蜻蜓正在空中追逐飞蝇,群蚁结队搬运已被分解的粉蝶,一只蟾蜍伏于车前草叶下伺机待发,花茎上方的蝴蝶收翅欲落,左侧两只蝗虫一卧一飞。画家以精湛的技艺,巧夺造化,思入妙微,在动静之间将观者视线引入第二组场景。

追随画笔可见,石龙子从翻卷舒展的菜叶中探出头来,蜗牛贴伏于叶背爬行,丛生的酢浆草掩映其间,蓝色蛱蝶徘徊轻飞,黑色凤蝶似被绽放的蒲公英所吸引。在宋元诗画中,蝴蝶具有特殊的文化内涵,常与“庄周梦蝶”等典故相联系。画家精心描绘不同品种的蝴蝶,既是构图所需,也以其生死对照传递万物始终在生长、变化的哲学意涵。

沿芳草向前,进入第三组场景:垂柳间一只螳螂牢牢抓住仍在挣扎的蝉;低处,另一只翅羽残损的蝉,为逃脱追击的螳螂,翻腾挣扎;后方,以柳叶作掩护的树蛙,在瞪大眼睛寻觅捕猎时机。画面中,柳叶与蝉、螳螂同色,强化了构图上的呼应感。

视线离开柳岸,转入竹间:缠绕于竹枝上的牵牛花静静绽放,一只黄蜂正在蜂巢下忙碌,它的同伴刚刚撕咬下黑丽翅蜻的一小片残翅,伤者仓皇而逃;不远处,一只红蜻蜓栖于竹梢,静观这一切。画家对不同昆虫足部的处理体现了其观察之细致。如绘蜻蜓足部时,线条细劲有力;绘黄蜂足部时,线条更飘逸。类似细节处理,展现了画家对形理两全的追求。

色泽浓郁的鸡冠花将观者引入第五组场景,花叶上布满嗜噬痕迹,以之为食的是两只螽斯,同样被引至此处的还有3只飞舞的彩蝶。循花径向前,来到最后一组场景,只见黄色蜀葵竞相开放,蜜蜂穿梭其间,一只红珠凤蝶在尽情享受花蜜。画面设色妍丽,画风却清新脱俗,堪称继承宋代工笔重彩遗风的代表。

画中动植物多有药用价值,这或许不是偶然。在宋代《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中,蜗牛、石龙子便并列“虫鱼部中品”,酢浆草、蒲公英同为“草部下品之下”。北宋《宣和画谱》则将“药品”“草虫”作为同一画科,附录于“蔬果”门下。画家将本草与昆虫绘于一卷之内,既诠释了“乾坤生意”的主题,也道出天地万物各有其用、相依共存的道理。《乾坤生意图》中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草虫多两两相对,或伴侣,或手足,共谋生计、相互协作。

草虫多见于诗之比兴,北宋的苏轼《题雍秀才画草虫八物》、黄庭坚《演雅》等诗词,对宋元草虫图创作影响甚巨。本卷跋文中,元代的松华道人借小虫“蠕动翻飞各有私”感叹“得失纷纷何日了”,陈深借“小虫营食”“潜窋伺伺”喻“鄙夫谋利”,以虫喻世,拟人,接续了草虫寓言文学的立意,丰富了画作的内涵。

画中情节与题跋亦有出处。螳螂、蝉、树蛙间的争斗,源于《庄子》“睹一蝉,方得美荫而忘其身,螳螂执翮而搏之……异鹊从而利之”。元代陈植所题“唯虫能天固尔性”“皆出于机入于机”,也出自《庄子》,阐述了对万物顺应自然、循环流转的认识。元代冯勉所题“冲抱长一如”,源于《道德经》,揭示了事物在对立融合中达到和谐、在竞争机变中得以生生不息的道理。

诗画相映,体现着古人的修身之道与人生智慧,也引导着今人在当下生活中洞见生命的本真。

(作者为山东大学艺术学院(威海)副教授)



▲扫描二维码,观看相关视频。

不久前,在第四十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上,80岁的蔡皋荣获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成为首位获得该项荣誉的中国画家。发表获奖感言时,她动情地说道:“我会一直为孩子们画下去……没有什么事业,比为孩子创作更幸福。”

耄耋之年依旧心系孩童,蔡皋用画笔收获世界的掌声,也为中国原创图画书在国际舞台开辟一席之地。然而,一花独放不是春,站在新起点,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中国不能只有一位蔡皋。原创图画书从“高原”迈向“高峰”,呼唤更多人怀抱这份“为孩子们画下去”的情怀,执笔耕耘。

中青年创作力量的培育是当务之急。目前,作品数量多、市场影响力大的图画书创作者中,年龄偏大者占比较高。从长远发展来看,人才断层的问题不容忽视。近年来,中国美术家协会实施“青年伙伴计划”——“儿童图画书创作100”项目,鼓励广大青年美术工作者参与原创儿童图画书创作,为提升图画书质量、壮大创作者队伍奠定基础。

人才队伍建设的成效,最终要靠作品来检验。近些年崭露头角的新生代画家,很多都有海外留学经历,具备国际视野,在张扬个性、锐意创新、把握潮流等方面具备天然优势。不过仅凭这些,尚不足以淬炼出打动人心佳作。因为图画书承载的不仅是故事,更是文化。创作者要理解中国文化在图画书中的内涵——不是符号化的“中国风”,而是骨子里的中国精神。同时,善用图画独有的视觉语言,以线条、造型与色彩搭建起和孩子对话的桥梁。翻开蔡皋的《宝贝》《桃花源的故事》《花木兰》等作品,灵动的人物、丰富的场景、精妙的构图背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长期浸润,是哲学、美学、诗学的深厚底蕴。

作为给孩子精神“打底子”的重要媒介,图画书兼具思想价值、文化价值与审美价值,其创作始终离不开先进儿童观与教育观的支撑。优秀的图画书,懂得尊重儿童的生命体验。院子里的花草树木、飞鸟鸣禽,都可以成为故事的主角。当孩子毫无关阗地走进画中天,便自然读懂故事里的深意,汲取向上的力量。蔡皋便始终坚持用图画书传承民族文化与民间艺术,描画自然之美与生活之美,呵护自在童年与纯真童心。她不止步于用具有中国风格的艺术语言描摹儿童的平实日常,更尽显儿童的情态与精神之美。蔡皋作品的儿童性是内在的,沉潜饱满的生命力中,在随机生发、无处不在的情趣里。一任天真的本性和本相,让蔡皋和儿童在艺术世界中相知相通。

各国优秀图画书历来注重多元文化的承载与表达,置身全球化语